

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论坛(专题讨论之一)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他同时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如何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脊梁”,业已成为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战略课题。努力成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体现了当代青年对真理的认同和追求,展现了中国青年立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责任与担当。2007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指示精神,团中央启动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追求和使命。从2016年起,本刊将开设“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论坛”,致力于在中国学术界培养一大批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扎实、科研能力突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资本论》的重新激活

王庆丰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摘要:《资本论》的再现过程就是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符码转换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语言和概念,在现代性语境下重新激活《资本论》的人类性价值。在重新激活《资本论》的过程中,采取“文本—思想—现实”的再现路径:深入解读《资本论》及其相关研究性文本,从“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相统一的视角出发,既能够揭示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创立的“新哲学”,又能够以《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透视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

关键词:《资本论》;文本—思想—现实;人类性价值;金融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B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2016)01-0012-07

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资本论》也是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资本论”。“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

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1]因此,无论是思想家本人,还是他的著作都无法脱离他那个时代的罗陀斯岛。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年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年代,是黑格尔哲学的年代,同时也是狄更斯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年代。那个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思考那个时代的《资本论》是否也应该被抛进历史的故纸堆,这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资本论》所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为什么要回到马克思,尤其是为什么要回到这部特殊的名为

收稿日期:2015-11-30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14JJD720003)暨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课题研究”(2013B41)

作者简介:王庆丰(1978—),男,河南林州人,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吉林省“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从事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资本论》的19世纪作品?如果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有效,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解读这部著名的、受人膜拜的经典。如果马克思的思想不再有效,那么为什么不提出新的思想,把第一卷中那些熟悉的口号统统送进档案公墓,就像所有曾经正确而现在已经完全过时的科学观点一样?”[2]

詹姆斯的这一追问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资本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智力或想像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3]。我们把人类思想史上那些几度隐没、复又重现的著作称之为“伟大的创作”。伟大的创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具有永恒的人类性价值。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些伟大的哲学著作在表征时代精神的同时,获得了永恒的人类性的意义。《资本论》正是这样的一部著作,表面上看来它仅仅是对西欧尤其是对英格兰19世纪上半叶社会现状的描述,但它一眼望穿了人类历史的深处。通过《资本论》,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他还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亦即我们常说的“人正在受抽象的统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资本主义就是消解“物的依赖性”。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107-108。不消解“物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是无法发展成“自由个性”的。马克思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就是《资本论》所具有的永恒的人类性价值。即使马克思所寻找到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被现代人遗忘到了历史的角落,但马克思作为一个“道德预言家”将与世长存。

在现时代,《资本论》再现的过程就是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符码转换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语言和概念。这一转换的实质就是《资本论》所具有的永恒的人类性价值在现代性语境下的重新激活。为了重新激活《资本论》,我们将采取“文本—思想—现实”的再现路径。

一、文 本

文本研究是重新激活《资本论》的第一步。对任何思想的研究和阐释都离不开文本解读,没有对文本的深入研究,所谓的思想创新就是空中

楼阁、人云亦云。对《资本论》的文本研究应当包含对两大类文本的研究:第一大类是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相关文本的研究。这一部分的文本是马克思本人的经典著作,主要包括《资本论》(第1-3卷)、《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3卷)、《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相关早期著作。在关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一个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早期文本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关系问题。朗兹胡特和迈尔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达到了完善的高度。虽然从表面形式上可以看出,手稿不是为发表而写的,而是表现出自己弄清问题的强烈特点,但是这份手稿毕竟是包括马克思思想的整个范围的唯一文献”[5]。在他们看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而《资本论》则表现出晚年马克思在思想创造力上的衰退和减弱。与这种观点相反,阿尔都塞虽然肯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他主张我们只能把《手稿》“当作《资本论》的先声,《资本论》的草稿,或《资本论》的草图。这幅草图虽然已初具规模,但毕竟还没有完全画好”。并且《手稿》“依然是哲学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哲学是马克思后来予以彻底否定的那种意义上的哲学”[6]。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资本论》与其早期著作之间是一种“断裂”关系。“断裂”意味着前后两者之间的转换一定是“异质性的”。这意味着,《资本论》和其早期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如果说阿尔都塞主张在《资本论》中能够读到马克思“真正的哲学”,那么在其早期文本中,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不成熟的”,甚至是“虚假的”马克思的哲学。这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把马克思的早期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成熟时期的文本《资本论》对立了起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节点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得以形成的前提和关键;另一方面,劳动力成为商品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异化劳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真实的理论意义就在于这一命题沟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资本论》和《手稿》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重大的差别,但并不存在本质

上的断裂。科拉柯夫斯基指出“‘异化’这个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经常出现,可是此后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就不那么常见了,《资本论》里更是极少使用。不过,这是用语的改变,不是内容主旨的改变;因为《资本论》中讲了人的劳动及其产物变得与人不相容的过程,所用的词语清楚表明马克思心里想着《手稿》中叙述的那种现象。”^[7]《资本论》和《手稿》之间并不矛盾。并且研究《资本论》,我们需要不断地回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有回溯到《手稿》,我们才能更加清晰、透彻地理解《资本论》的理论旨趣,而不至于迷失在《资本论》中的事实材料里。

第二大类是对《资本论》哲学思想解读史的研究,亦即对解读《资本论》的文本进行研究。《资本论》的历史就是《资本论》的解读史,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强调同一文本的不同方面,赋予某些方面特殊的重要性,从而揭示出它的不同意义。马克思去世之后,如何解读《资本论》就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形成了不胜枚举的研究性文本。这些著作主要包括:(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恩格斯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重点应当放在三个方面:一是恩格斯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并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在与马克思共同完成的《资本论》创作过程中,恩格斯独特的理论贡献是什么?二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释和发展;三是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与《资本论》的关系。列宁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重点有三:一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与《资本论》的理论传承发展关系;二是列宁《哲学笔记》对《资本论》的理论实质与方法的深刻阐释;三是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资本论》所阐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运用于具体社会形态的重要尝试的研究。(2) 恩格斯之后以第二国际理论家为核心的对《资本论》思想的宣传和拓展。重点研究对象为: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资本论》的解读,希法亭《金融资本》将《资本论》理论应用于金融领域的尝试,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对《资本论》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释等。(3) 苏联学者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重点是凯德洛夫、柯普宁及弗罗洛夫等关于《资本论》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4)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重点包括:一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有关《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理解;二是阿尔都塞《读〈资

本论〉》中关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重要阐释,尤其是关于《资本论》对象及其理论性质的研究;三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科西克等关于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与《资本论》关系的理解;四是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柯亨等围绕剥削问题、社会正义问题等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新理解;五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左翼学者结合晚期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对《资本论》的一些新的解读,如梅扎罗斯、施韦卡特、大卫·哈维、詹姆逊、雅各·比岱、克林尼克斯等人对《资本论》的研究。(5) 日本学者望月清司、柄谷行人、见田石介、宫川彰、内田弘等人对《资本论》的研究。(6) 中国学者关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占据的意识形态地位,《资本论》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仅限于经济学界,哲学界更看重马克思早期哲学意味比较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哲学界对《资本论》关心者寥寥,并且从来都是把《资本论》仅仅当作一本经济学著作,研究其中的哲学思想,而不是把《资本论》当作哲学著作去看待。《资本论》很少受到中国哲学界的关注,但这一情况在21世纪初得到很大改观,涌现出一大批相当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和论文。

二、思想

重新激活《资本论》的第二步是思想。文本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训诂和考证,而是为了出思想。学问家和思想家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思想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学术研究之上,才能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否则就是胡思乱想。恩格斯所谓的哲学“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学问家如果不推出自己的思想,做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所谓的学问就永远是“小学”,而其人充其量也只是学术工匠而已。

如何通过文本研究形成我们自己关于《资本论》的思想呢?在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解读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两条解读马克思的思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解读各执一端、针锋相对。虽然分别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和科学主义倾向非常系统地揭示了出来,但同时也造成了对马克思思想取向的割裂。因此,无论是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如果把马克思整个思想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过程或总体的话,我们就绝对不能排斥掉早期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展现的人本主义,也不能排斥掉《资本论》所侧重的科学主义,应该从两者相统一的视角去解读《资本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相统一的角度去解读《资本论》。《资本论》也正是在两者相统一的意义上构建了马克思的“新哲学”。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8]4}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马克思把现代哲学的任务定位为“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马克思的这一定位绝对是从存在论的意义上得出的,从而奠定了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旨趣。但是,马克思并不仅仅想揭示人类的这种“异化”的生存状况,他还想揭露这种异化的根源,并且找到扬弃这种异化的现实道路。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异化的扬弃,理解为人向人的本性的复归。《资本论》中的大部分概念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都已出场,但都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进行规定的。因此,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文本和理论依据,从而将马克思理解为一个抽象的人道主义者,也就不奇怪了。这种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性特征之一,不应该遭到拒斥和否定。

到了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开始彻底清算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试图构建“真正的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8]526}终止黑格尔思辨哲学之后,马克思重新建立起来的新哲学是“真正的实证科学”。这种“真正的实证科学”并不是“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它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我们开始要谈的

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9]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从“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揭示,就是在破解“存在的秘密”。马克思把在“理性具体”的意义上所揭示的“现实生活过程”称为“现实的历史”。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非常明确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这样的论断“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0]。

“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也成了我们解读《资本论》的方法论原则。阿尔都塞把《资本论》和其早期文本对立起来,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的人本主义取向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科学主义取向割裂开来。排斥科学主义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终陷入的是抽象的人道主义,阿尔都塞批判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也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阿尔都塞完全拒斥和不顾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追求,而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恢复到纯粹的科学主义,这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雷蒙·阿隆批评萨特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是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这种评价是极其到位的。马克思在批判孔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时候,就已经指出纯粹的、客观的没有任何价值预设的社会科学是不存在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必然是有价值取向的,没有价值取向的社会科学是对时代问题的回避。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早期资本主义问题回应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

《资本论》正是在“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统一的意义上,构建了马克思的新哲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三大拜物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异化的生活状态,提出了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逻辑,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雷蒙·阿隆从剩余价值理论的视角揭示了《资本论》的这一特征。他指出“剩余价值的理论具有科学的和道义的两重作用。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威力。”^[11]由于不了解《资

本论》的这种统一性,在《资本论》的解读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解读者企图把《资本论》解读成同传统哲学一样的哲学文本,消解掉《资本论》中的经济学内容。而另一些解读者则试图排斥掉《资本论》中晦涩的哲学内容,发现一个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雷蒙·阿隆正视《资本论》的这种奇特结构,但他认为,《资本论》是经验科学和道德判断的混合物,是一个“模棱两可”或“含混不清”的文本。如果不从二者相统一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资本论》,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新哲学,无法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把握到的独特的存在——“现实的历史”。“《资本论》表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想与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不可分割地统一的,马克思对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与他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分割地统一的,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是不可分割地统一的。”^[12]

三、现实

《资本论》激活的真正实现,就是将《资本论》作为退入背景的知识分析我们时代的现实。因此,在思想中把握现实是《资本论》重新激活的最后一步。相对于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研究19世纪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撰写新时代的“资本论”。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为人类的未来探寻一条切实可行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就开始出现了一种“历史的终结论”思潮。在这种观点看来,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人类社会制度,“历史”终结了。这种思潮逐渐成为西方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并在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一著作中被推到了极致。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一直到大卫·李嘉图,他们的研究框架都渗透着对资本主义的非批判性的假定,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看作是自然规律。因此,古典经济学家们并不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和对立,李嘉图就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当作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只不过他们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当代西方思想家甚至抹杀了这些对立,并且认为这些对立是马克思费尽心机制造出来的结果,他

们认为,马克思的意义仅仅在于指出了放任资本主义的一些致命缺陷,而这些缺陷通过一些根本性的途径加以改革,就是可以克服的。因此,当今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如出一辙,其所做的工作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下,对现有制度的修补和完善。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与这些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反。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真实性,研究资本主义被取代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把资本主义当成“历史的终结”。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的完满状态,它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13]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是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最根本的理论立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众多观点,但最为核心或最为根本的观点是他的关于“人类自由解放”的理论旨趣。这一理论旨趣不仅体现在《资本论》中,而且一以贯之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8]11}所谓的“人类的自由解放”就是从被奴役关系当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断言:与奴隶制和封建制一样,资本主义是一种奴役和剥削的制度。因此,在我们时代现实性的意义上,这种被奴役的关系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但是,奴役关系在封建社会中是明显的,在奴隶社会中也是明显的。也就是说,未付酬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事实与比率在这两个社会里是明显可见和公之于众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工人的剩余劳动和未付酬劳动的榨取是隐而不显的。马克思《资本论》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这种剩余劳动是如何存在的,以及这种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率是如何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马克思告诉我们:“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14]823}马克思击穿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假象和幻觉,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奴役关系呈现在世人面前,为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制

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奴役和剥削制度,人类必须从这种奴役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为根本的观点。其他诸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经济危机等观点都是为这一根本性观点服务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伊始,卢卡奇就开始倡导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把马克思的著作当作“圣书”来解读。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15]47-48}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一问题必须在和黑格尔的关系当中才能得到澄清。第一,我们必须在黑格尔辩证法的高度上去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否则必然导致肤浅和平庸。辩证法的认识不是一种理性的抽象,而是一种内在反思意义上的“理性具体”。黑格尔反对思想的主观任意性,强调思想的客观性,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的。在马克思看来,“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4]42}。第二,我们必须在批判黑格尔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4]22}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之所以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是因为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它是从“必然灭亡的”或“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

运用《资本论》去把握现实,就是自觉地以《资本论》中的无产阶级立场、人类自由解放的观点和批判的辩证方法去把握我们的时代。“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现象上的拜物教假象成功地掩盖了现实,而且被掩盖的不仅是现象的历史的,即过渡的、暂时的性质。这种掩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环境,尤其是经济范

畴,以对象性形式直接地和必然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对象性形式掩盖了它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范畴这一事实。它们表现为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15]64}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统一的。只有这种辩证方法才能摧毁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所虚构的永存性,也才能摧毁它们的物化性质,从而为认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廓清了道路。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19世纪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代是一个工厂林立、到处充满着饥饿和贫穷的世界,是一个以数量众多的工人阶级为标志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剥削、压迫、痛苦和不幸的世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描述和洞察。通过阅读那个时代的一些经典文本,无论是哲学著作,还是文学名著,我们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人类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所遭受到的苦难。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4]871}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的夸张说法,而是对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真实描述。“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4]10-13}相对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革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服务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共同建构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表现形式。如果说“工业资本”是传统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那么“金融资本”就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资本开始大量地与银行资本结合,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得以形成。金融资本通过对工商业的长期贷款、投资、股票和债券的买卖,从而在事实上操控了工商业,进而成为整个经济生活的基础。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双向依赖的关系。金融资本需要通过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获得资本的增殖,同时工业生产也需要金融资本的投入和支持,从而实现产业资本的增殖,进而实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产生了“资产证券化”浪潮。当今的金融资本已经完全脱离产业资本独立出来了。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向度的依赖,即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经济,但后者不必依赖前者。简而言之,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一种双向度的依赖关系转变为一种单向

度的依赖关系。在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那里,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地为自身“融资”。金融机构对贷款或投资给实体经济获得资本增殖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是热衷于金融市场的炒作,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也就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还需要通过实体经济才能产生增殖(G—W—G),而到了现在的金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自身直接就能增殖(G—G)。如今的许多投资银行家是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社会责任的人。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是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和努力”等美德了,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资本主义“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5]。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不论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金融资本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物化关系放大了极致,从而也把“资本拜物教”放大了极致。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外部景观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但是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资本增殖的逻辑却没有丝毫的变化,因为它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联系在一起。金融资本只不过是把资本增殖的逻辑“G—W—G”进一步推到了“G—G”,从而也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危机转为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时至今日仍有其道理。只有当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冲破自身的边界,开创一个崭新局面时,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但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16]资本增殖的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边界,超越这个边界,意味着资本增殖逻辑的失效,但也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一种新型社会形态的到来。“G—G”的资本增殖模式已经冲破了资本增殖的合理性界限,所产生的只能是财富增殖的幻象,它会把整个资本主义推入到欲望的深渊。“为了理解这个世界以便改变这个世界,马克思绝不仅仅满足于评论它、揭示它;他的思想,他的《资本论》,这道在当时尚未震响的‘霹雳’,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

个起点。”^[17]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杨,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2.
- [2] 詹姆斯. 重读《资本论》[M]. 胡志国, 陈清贵,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7.
- [3] 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吕良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C].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285.
- [6]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49.
- [7] 科拉柯夫斯基. 马克思主义的主流: 第1册[M]. 马元德, 译.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2: 307.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66—67.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241.
- [11] 雷蒙·阿隆. 社会主要思潮[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142.
- [12] 孙正聿. “现实的历史”: 《资本论》的存在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2).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70.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6]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 李杨, 任文科, 郑义,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 15.
- [17] 丹尼尔·本赛德. 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的[M]. 李维文, 译.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3: 209.

[责任编辑: 张圆圆]